

110年前,他扑灭那场瘟疫还推动了分餐制

临危受命的伍连德科学战胜鼠疫,推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

本报记者杨思琪

每一次流行性传染病暴发,分餐制都会被大力倡导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,分餐制再次成为备受追捧的新风尚。

而在一个多世纪前,同样是一场瘟疫挑起一场浩劫,31岁的年轻医生伍连德提出旋转餐盘的概念,放上公筷、公勺,减少细菌传播。一个小小的创新,却在人类文明史上迈进一大步。

那是1910年岁末,一场引发肺部病变的鼠疫在东北三省肆虐。临危受命的伍连德,从天津一路北上,成功扑灭了一度令人绝望的瘟疫,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。

如今,伍连德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,闪耀在小学校门旁,他的雕像屹立在校园,他的故事再次传遍……他离我们并不遥远。除了分餐,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、“伍氏口罩”的发明,伍连德都是幕后推动乃至首创者。

发现鼠疫

1910年12月24日,哈尔滨火车站。迎着漫天大雪,听着遍地哀号,伍连德和学生林家瑞踏上了这片“谈鼠色变”的苦难之地。

出生在南洋,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,伍连德是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,先后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、德国科赫实验室从事传染病病原学和疫苗学研究。他受命担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,3年后,又被任命为东北防疫总医官,一路北上,去消灭一种不明原因的怪病。

病人先是发烧、气喘、咳嗽,过不了几天便吐血而死,死后皮肤呈紫红色。这种病在哈尔滨傅家甸已经流行了一个多月,死亡人数每日递增,疫情失控,“如水泻地,似火燎原”。

那是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天,内忧外患。从官员到百姓,从朝廷到地方,人们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。日本与俄国则以防疫为由,虎视眈眈、趁火打劫。

为了尽快找出病因,伍连德在客栈一间幽暗的小屋里,对一具遗体进行了解剖。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是中国传统观念,因此这场解剖是秘密进行的。

很快,伍连德在血液中有何发现——光学显微镜下,鼠疫杆菌的形态暴露无遗。一系列研究证明土拔鼠是其来源,这是一场由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。作为以往腺鼠疫的升级版,肺鼠疫可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。

这是人类流行病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分类理论,成为此后伍连德指挥战“疫”的科学依据。

科学战“疫”

伍连德立刻向朝廷建议,派遣军队,调遣医生,动用警察协助封锁交通要道。同时向哈尔滨百

“1910年岁末,一场引发肺部病变的鼠疫在东北三省肆虐。临危受命的伍连德,从天津一路北上,成功扑灭了一度令人绝望的瘟疫,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。他不仅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——“伍氏口罩”,还提出旋转餐盘倡导分餐制,并推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

姓宣传鼠疫防控知识,教他们可行的防护方法。

初来乍到,风俗习惯、语言交流都让伍连德颇感为难。面对当地官员和医生的不理解、不认同,他没有退缩,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判断,分享自己的发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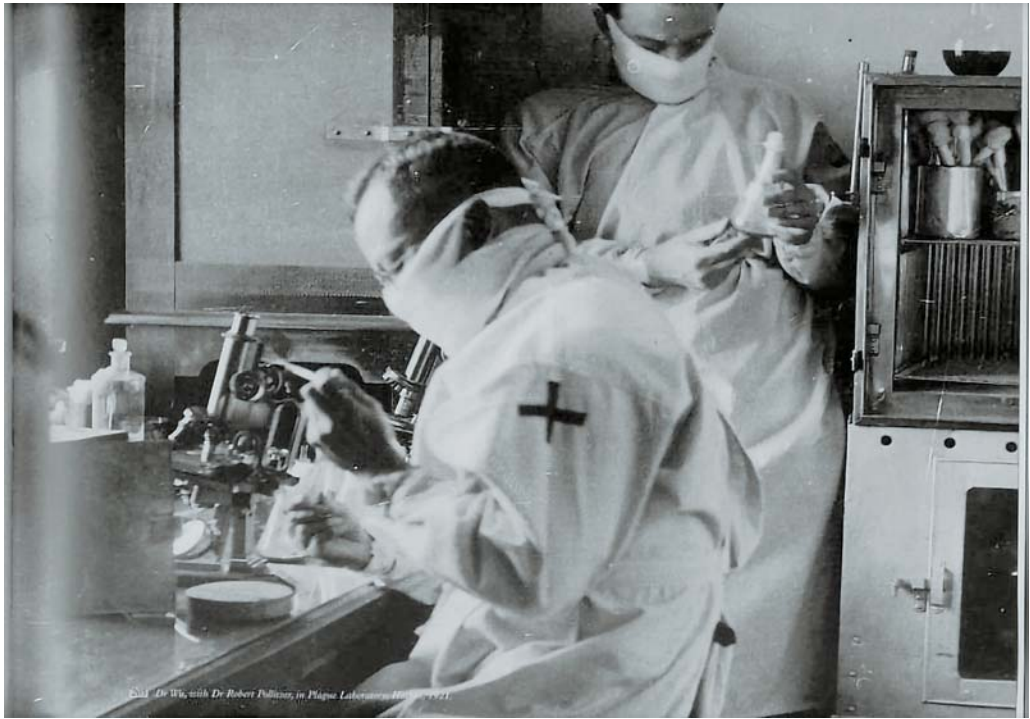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,他的方案被曾参与过印度、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专家、法国医生迈斯尼全面否定。迈斯尼主张飞沫没有传染危险。可不到十天之后,迈斯尼便染上肺鼠疫,以生命为代价为错误买单。

这一消息传来,巨大的恐慌情绪和看不见的“敌人”交织在一起,如一张巨网笼罩在哈尔滨上空。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伍连德,祈求一丝曙光。

伍连德曾在自传中写道:“很明显,传染是通过病人咳嗽和飞沫一个接一个发生,能够阻止的办法只有严格地将病人从健康人群中隔离开来……药品没有丝毫作用,因为这种疾病对肺的破坏太快了。”

隔离,是最有效也是最廉价的防疫之法。在伍连德的筹划下,整个傅家甸被分成四个区,往来铁路实行严格检疫,流动人口受到管控,学校、客栈、剧院和浴室变成了消毒站,寺庙和废弃的房屋改建成病房和医院。

当时每个区有一个首席医官、两名助手,还有卫生警察、消毒员、检查员和担架员。居民都要佩戴臂章,分红、黄、蓝、白不同颜色,只能在本区活



▲1911年,伍连德和助手在他的第一个实验室工作。 图片由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提供

动,即使住对门,也不准来往。警察每天派人到各家各户检查。

为防止飞沫传播,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。把一块外科纱布折叠起来,中间衬上一块药棉,然后把两端剪开做绑带,制作方便、成本低廉,防护也严。一批妇女批量赶制。人们戴上口罩,把嘴和鼻子遮挡起来,称它为“伍氏口罩”。

不仅口罩,餐厅旋转餐盘也在伍连德的倡导下应运而生。

中国民众喜欢集体吃饭不分餐,但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,用筷子夹同一盘菜会引起交叉感染。伍连德提出放上公筷、公勺,采用西方的分餐制,尽量减少细菌传播。

随后,伍连德所居住的道台府采取“双筷制”,即每人使用两双筷子:一双取食,一双入口。这样,卫生的问题解决了,但不够用。

伍连德又建议设计一种旋转餐桌。当时的衙门主厨郑兴文灵机一动,在八仙桌上装个圆板,中心以铁柱为轴,让圆板旋转起来,并在每道菜旁放一勺或一筷做公用。这样既解决了共食风险,又兼顾了中式菜肴的特色和饮食习惯。从此,旋转餐桌便流行起来。

扑灭疫情

隔离、消毒、阻断交通、减少接触……十几天

过去,傅家甸的疫情依然没有减轻。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,多则上百人,有一天攀升至183人。伍连德一遍遍回想:如此健全的防御体系,到底哪个环节还存在漏洞?

一天,伍连德来到城边坟场,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。雪地上横七竖八的棺木露天摆放,俨然一个巨大传染源。鼠疫杆菌在低温下可存活三个月到半年,如果鼠类和其他动物啃食后,再把病菌带回人群,鼠疫将循环往复,没有止息。

数九寒天,哈尔滨土层冻结,这些遗体无法安葬,大规模焚烧成了唯一选择。然而,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都是入土为安。这样大胆的想法不合习俗,更有悖伦理。

伍连德和在外务部任职的施肇基,一个处江湖之远,一个在庙堂之高,共同促成清政府的决定。

1月31日,大年初一,哈尔滨城郊的坟地火光冲天。当时,很多官员不愿意去坟场监督,伍连德亲临现场一个个清点。

适逢春节,为了消弭全城压抑的情绪,伍连德嘱咐防疫部下发传单,号召大家燃放爆竹,一冲晦气,同时释放硫黄起到消毒作用。

3月1日,时针指向零点。哈尔滨防疫局内,所有人屏住呼吸,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——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。

分餐我国自古有之,该“出口转内销”了



宋扶日

今年的这场疫情,带给人们多种警示与思考,它改变了多数人的工作、学习方式,也促进了很多业务的发展,而与饮食关联紧密的分餐制,最近也被大力提倡。

相较于合餐制,分餐制明显更有益于健康,能减轻病毒传播的概率,也会减少食物浪费现象,又令人有选择菜品的自由。而合餐制,我们都清楚,在不知不觉间会混入很多隐患。尤其在当下,此种方式更是令人担忧。

合餐制之所以会大面积流行,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显著表现方式,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营造出亲切的氛围。我国本就是美食大国,中国人又好客热情。人们在餐桌上圆融一体,内中深具人情意味,最可体现和喜欢。尤其在年夜饭、寿宴等场合中,合餐显然更易于人气凝聚、拉近距离、共享食味。另从酒店的角度说,合餐制的菜品,便于出餐,色味也可保持完善周正。当然,酒店也同时能节省人力、节约物资,从而减轻运营压力。

上述欢乐热络的气氛,很少有人不喜爱;可是,往往在这样的气氛中,安全隐患会慢慢潜伏下来。严重的病毒暂且不提,只单说极易引起胃部病变的“幽门螺旋杆菌”,就足以引起公众警惕。

商周时期已有分餐形式

许多人一听到分餐制,第一反应就是:“那是西方人的习惯吧?”确实,西方人的分餐制,比较深入大众视野。大约17世纪,它在欧洲大陆大行其道,彰显出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,带有民主、平等等观念的痕迹。此后,欧洲餐桌礼仪更为严格,其中隐含的尊重他人的习惯,蔚然成风。

而欧洲人也并非一直如此,分餐制是人们在考虑到诸多卫生问题之后,经过多次改革才确立下来的。其实,在17世纪前的大段历史时期中,欧洲人更喜爱聚在一起合餐吃饭。中世纪时,合

餐属常见之事,有时连汤碗都是共用的……这同古代西亚、中亚地区的人们的合餐习惯有一定关联。毕竟,那些地区的文明,曾一度深深影响欧洲。

只能说,分餐是西方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习惯,但却不是他们的专属。我国分餐制的历史,更为跌宕起伏,而且一直影响着亚洲邻国。

日本的分餐制,现今依然存在,可追溯至11世纪。《源氏物语》中,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:“铺设四十张中国席,其他坐垫、凭几儿等物也都一律崭新精致”。这里说的“中国席”,便是分隔明显的单独桌案。紫式部寥寥几笔的描述,便体现了当时的日本贵族对魂牵梦萦的中国文化的尊崇。

我国早在商周时期,就出现了分餐的形式。但其显著的特征是对层级地位的彰显,是一种礼制。宴席呈现出的是一种气场,更能突显王侯威仪。《周礼》有载:“设席之法,先设者皆言筵,后加者为席。筵长席短,筵铺陈于下,席在上,为人所坐藉。”这便是针对筵宴的规格标准。

此外,熟悉文物的朋友大致都会了解,那时的餐具都有明确的规格分类。如周天子需“九鼎八簋”,诸侯为“七鼎六簋”等,它们共同营造出严整的氛围,秩序井然。这种情形,让我不禁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,其用餐方式与社会等级的联系,也是甚为紧密。印度的婆罗门贵族,用餐时都有专设房间,这一方式可谓分餐制的极致。而我国青铜器的“仪仗队列”,更是从每个细节中,体现着阶级分层。

到了春秋战国、秦汉及三国时期,分餐制依然继续,尊卑观念及进餐礼仪,依旧蕴含在宴席的程序里。《礼记》中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”的教义,人们也一直在遵守。在许多关于那些历史时期的壁画上,都描绘着宾客“一人一案”的情景。

合餐制逐步定型

战国时的孟尝君,就用这种方式宴请八方来



▲《韩熙载夜宴图》(局部)。 新华社资料片

客。关于他的故事传记中,还出现过一次因为误会引发的事件:他的一位门客,有次不知何故,觉得自己的“伙食”比他人的档次差,认为自己受到羞辱。孟尝君得知此事后,便将自己的食物拿给他过目。这位门客发现,主公的饮食同自己的饮食,分明是差不多的!

后来,此门客竟因自己的误会,愤恨羞愧而自杀……虽然结果有些极端,但这个故事却说明,那时分餐制的普遍。而此人的自杀,也是那时“知耻近乎勇”的社会风气,所引发的结果。

比起商周时,春秋战国至三国时期的宴会规矩,略微松动了一些,因而融入了一些表演活动。如《三国演义》中,周瑜在群英会上舞剑的情节、曹操在铜雀台设宴时的“横槊赋诗”,当属著名的宴会“节目”。

自魏晋南北朝始,人们的用餐方式顺遂社会演变,出现了较显著的改观。这一时期,战乱引发民族融合,游牧文化风习渐传至中原。游牧民族围坐聚合、共进酒食的合餐形式,冲击了中原饮食礼制。中华饮食文明混入北方民族血液基因,形式变得多元化,礼制更有松散倾向。

隋唐直至五代十国时期,合餐的趋势更为明显。大家围坐饮食,但食物还是彼此分明,餐具也是成套分配,令人想到日本的“定食”。

这种具有合餐气氛的分餐形式,其实是现今最值得恢复的形式。这样做,合餐的气氛能够保持,又保证了分餐制的卫生标准。

我国作为美食大国,不仅要精研食物本身,关于“吃的方式”中蕴含的文化意旨,更是值得开拓。共用美食的待客之道,与防控“病从口入”的举措,关系着情感与理智,应当有所侧重。

宋代,合餐进一步定型,这与市民经济的发达不无关系。两宋的都城,饮食行当极其丰富,菜品繁密、品相细腻。各品类的酒楼、食肆也是不可胜数,常常是食客满溢。

在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,可以寻觅到那些与现今酒楼情态无二的景象。在现今的开封和杭州,也依然能发现宋代美食的芳踪。

当时,合餐趋势愈发明显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有一项不得不提:宋代出现了铁锅。烹饪工具的变革,引发了一系列餐饮革命。耐用结实的铁锅,增添着菜品的丰富性,催生了“花式炒菜”。再加上那时原材料的种类极其丰盛,比如植物油和各类从西域引入中土的蔬菜,都加强了美食的丰富性,因而,合餐的形式更为普遍。

当时,北方民间出现了一种负责统筹宴会节奏、安排席间次序的职业——“白席人”,这恰恰是合餐制的产物。这一职业,通常是选择某地较有权威、有见识的人来担任。此外,他还能带动整个宴席的气氛,时而也会在席间展示自己的才艺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,就出现过关于这类职业的描述。

此后,南宋退出历史舞台。元代时,合餐制的典型——火锅,愈加深入人心。时至今日,火锅仍然是多数国人的心头好。而到了明朝,市井文化发展更为迅速,虽依然存留分餐制,但民间的合餐制,早就形成了广大规模。背景设置为明末清初的《红楼梦》,其中描绘的贾府大宴上,就没有众宾团宴的场面吗?

医学曙光

哈尔滨的防疫措施做了表率,这里的模式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。随后,长春、奉天(今沈阳)、铁岭……东北各主要城市纷纷传来清零的捷报。

到4月底,整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鼠疫被彻底消灭。这场罕见的瘟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,花费白银一千万两。其中,哈尔滨傅家甸有6000多人死于鼠疫,占了傅家甸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
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,不到四个月就成功击败一场传染病,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。当时出版的《远东报》这样评价:“其能以如此有效者,皆赖伍医生连德之力。”

伍连德救了哈尔滨,救了东北三省。他的睿智与严谨,他的担当与坚守,他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,引领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第一次获得各级官府的重视。

1911年1月,正是伍连德领导抗疫的关键时刻,施肇基动议,举行一次国际鼠疫大会,邀请各国专家学者交流研讨肺鼠疫防治办法。

4月3日,万国鼠疫研究会如期举行,来自英、美、俄、德、法、日等11个国家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奉天。一份长达500页、名为《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报告书》的报告备受关注。伍连德赢得了与会各界的敬重,被推举为大会主席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,奠定了中国在鼠疫研究领域的地位。

此后,伍连德将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事业。

1912年11月,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,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。伍连德任总医官,中国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。

1926年9月8日,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,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。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高等院校,也就是如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。

1926年,伍连德写作的《肺鼠疫论述》,由日内瓦国联出版社出版。

1935年,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提名伍连德为候选人。

伍连德还获得了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的“鼠疫专家”等多项国际顶级嘉奖和称号。伍连德在《鼠疫斗士》的自序序言中写道:“我曾将大半生献给古老的中国,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,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,往事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,新中国政府成立,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。”

如今,伍连德的雕像伫立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内,人们驻足、留念,也从中思考什么是伍连德精神,什么是天下真国土,什么是科学的力量,什么是人性的光辉。

清代时,合食共餐愈发成了一件寻常事。单独桌椅的普及,满清统治者的特定民族习惯……许多原因,都促进了合餐制的深入巩固。

不过,当时也出现了外来文化影响,如康熙年间的《御览西方要记》中,介绍的西方分餐制习俗:“每人各有空盘一具以接,专用不共盘,避不洁也。”但它却并未动摇合餐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。所以,后来乾隆下江南时,他本人虽是单人单桌吃饭,而侍从们却都是合食。

分餐只是形式,不会分隔情谊

近现代,我国曾出现过不少关于分餐制的呼声。1936年,曾成功战胜东北鼠疫的伍连德医生,曾指出:“最善之法,莫如分食”;2003年,SARS肆虐时,社会上也大力提倡过此用餐方式……

不过,千余年形成的习惯意识,一时难以更替,所以,生活中我们大多面对的还是共享食物的场面。偶尔我也会心感担忧,特别是同不熟悉之人共餐时。

不过,现在很多餐厅,都在使用公勺公筷了,这是一种改观。疫情过后,可能会有更多餐厅深化分餐制度。

原本,分餐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如能随时代变迁而融入创新意味,最终演变为新的生活方式,将会一举多得。

饮食是生活的根本,美食则彰显中华文化印痕。恰当的用餐方式,更能为文化增彩。我认为,分餐制会令个体的美食体验更为纯粹,令人们自然而然与隐形毒素保持距离。如果人们能够适应正向的饮食模式,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会更上一个台阶。

分餐只是形式,并不会分隔情谊。分开碗碟,也不会阻碍交流。反而,在这种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环境中,大家的交情会更为深化。